

· 科普史 ·

踌躇的西行：中国大陆科幻的命运变迁*

辛禄高 郑 军 译

科幻很可能是由鲁迅最先引介到中国的，他在1902年（据吴岩）或1903年（据饶忠华）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心游记》。同时，鲁迅还写了《〈月界旅行〉弁言》，试图对科幻文学的原理进行界定。1917—1918年，另一名著名作家茅盾，和他弟弟沈德济合译了法国、英国、美国的科幻小说，凡尔纳和威尔斯依然排在榜首。鲁迅在译介《月界旅行》时，赞扬了他称之为“科学小说”（当时尚无“科幻”的说法）的可能性：“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他希望通过“给科学小说穿上文学的外衣”，以对大众传播科学知识。这一目的成为此后80年中国科幻存在的理论依据。

要讨论中国科幻的起源并不容易，因为这取决于如何界定“科幻”这一文体。伍叶等人认为，科幻在中国一直就存在，道家经典《列子》中的许多神话就包含了科幻的因素，其中还有制造机械人的故事。茅盾将民间传说“嫦娥奔月”看作一个科幻原型：将月球看作一个居住的星球，在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如果撇开神话传说不谈，只考虑凡尔纳或威尔斯以后的科幻，有三部作品可以看作中国最早的科幻。

第一部作品是《十年后的中国》，发表于1923年1月的《小说世界》。里面提到，未来的中国发明了一种轻量而高效的“光发射器”，把

帝国主义侵略者都赶出了中国。第二部是老舍于1932年创作的科幻小说《猫城记》。第三部是顾均正于1940年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和平的梦》，饶忠华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他曾经提到，在1961年他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询问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和科幻作家，顾先生回信告诉他，有比他的小说更早的作品，甚至还提供了一些线索。可是很遗憾，这些信件后来都丢失了。饶忠华认为，中国科幻创作开始于晚清，甚至更早。

大多数论者认为，在1950年之前，中国的科幻小说非常少，因为那时中国的工业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1950年代以后，共和国开始了工业建设，因而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次科幻高潮。那时的科幻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些译自英语和俄语的科幻小说，其中就包括威尔斯的《隐身人》和托尔斯泰的《艾奥丽塔》。和鲁迅一样，当时的动机也是希望通过科幻激发大众对科技的兴趣，此时的科幻主要阅读对象是青少年。吴岩在《历史与中国科幻的发展》中对这种“功利主义”表示了忧虑和遗憾。

即使现在，大多数中国科幻依然由科普出版社出版，科幻作家是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而非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因为当时的科幻旨在向青少年传播科学，于是科幻成了儿童文学的一部

收稿日期：2009-05-14

译者简介：辛禄高，东华理工大学讲师，文学硕士，现为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国家公派汉语教师”，Email: lgxin@ecit.edu.cn；

郑 军，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科幻作家，科幻理论家。

* 此文由 Mikael Huss 发表在美国《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00年第3期，原题为 Hesitant Journey to the West: SF's Changing Fortunes in Mainland China。翻译时略有删节。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有限，而且此文发表于2000年，所以有的地方不是很准确。

分。饶忠华特别提到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三部影响较大的儿童科幻：郑文光的《第二个月亮》、童恩正的《古峡迷雾》和叶至善的《失踪的哥哥》。尽管在 1960 年代也出现了一些成人科幻，但都只是在《科学画报》之类的杂志上发表。随着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科幻就彻底消失了，直到 1978 年才再次出现。

1978—1983 年常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邓小平上台，制定了新的任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如拉瑞斯（Laris）所指出的，在这五年中，有 800 多部科幻短篇小说发表，新一代的科幻作家给此文体带来了新的理念。童恩正于 1978 年发表的著名的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成为“黄金时代”的先声，甚至当时还被拍成了大受欢迎的电影。那时涌现了 20 多种科幻杂志，其中包括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黑龙江的《科学时代》、四川的《科学文艺》，不过只有《科学文艺》在 1970 年代后依然存在。这些杂志都拥有成千上万名读者，并涌现了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等深受欢迎的科幻作家。童恩正于 1979 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对科幻文艺的看法》，他提出，科幻文艺并不介绍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这篇文章影响巨大，被吴岩看做中国科幻第二个时代即“后功利”时代的开端，此后中国科幻作家开始探讨人性、社会等问题。

因此，科幻作家开始尝试切入一些反映社会现实、批评社会的科幻。1979 年，郑文光创作了《地球镜像》：外星人拍摄了一种全息图像，纪录了文革的恐怖历程。1983 年保守势力对科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将之作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嘲笑科幻作家“传播伪科学”。叶永烈——或许是现在人们还知道的那个时代唯一的科幻作家——此时受到一位古生物学者严厉的批判。叶永烈的一篇科幻小说写到，一群科学家在火山上发现了一个恐龙蛋，并用化学技术进行孵化。这篇小说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伪科学”的重要例证（颇具反讽意味的是，1995 年北大一群生化专家恰恰从此小说发现恐龙蛋的地方，找到了一枚恐龙蛋，并提取了 DNA 用于克隆研究。因此这篇小

说的假设就不再显得荒唐）。1985 年，叶永烈又创作了一篇颇受争议的小说：中国科学家在新疆的沙漠中发现了治疗艾滋病的配方，从而拯救了世界。这部小说被卫生部禁止出版，理由是：小说暗示中国发生了艾滋病，而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体现，我国从未发现过艾滋病例。但这部小说中，中国已经受到艾滋病的袭击，如果出版，势必引起误解，造成新闻混乱。

在一次“批判会”上，郑文光 1983 年创作的小说《太平洋人》受到了同样的指责；甚至童恩正也受到剧烈的抨击。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1980 年代的大多数作家都对此保持沉默，科幻创作再次完全停止了。

中国科幻于 1991 年东山再起。此年《科学文艺》更名为《科幻世界》，孤独地摸索着中国科幻的发展道路，希冀在中国永久地建立科幻这一文体。此时，政府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一再呼吁发展科幻，尽管理由依然是老生常谈的“功利主义”——科幻小说可以唤醒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1997 年的北京世界科幻大会就得到政府的部分资助。

杂志是中国科幻亚文化圈传统而重要的载体。今天唯一光彩夺目的、专门登载科幻的杂志是《科幻世界》，月发行量超过 25 万，很可能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一份科幻杂志。它经常刊登一些非常有前途的作家如星河、王晋康、韩松的作品；它还为中国所有科幻读者提供了一个论坛。据悉，由杨潇领导的《科幻世界》的编辑们，为宣传和提升中国科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组织一些科幻会议（如几次世界科幻大会）。他们还出版一些科幻书籍。在 1991 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世界》被世界科幻协会选为全世界最好的期刊。他们还设置了四个文学奖项。1991 年更名之后，它将自己的阅读对象定位为青少年，并严格执行非营利的办刊宗旨。每期都有一至多篇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的作品；至少一篇外国科幻小说译著；还有几篇在校学生的优秀科幻习作——它们是从《科幻世界》许多竞赛中涌现出来的。另外，《科幻世界》还刊登中外科幻画家的插画、关于最近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评论、著名作家的科研

论文以及一些科幻评论。

其他一些杂志,如《飞碟探索》、《奥秘》、《科技潮》、《我们爱科学》、《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等,也偶尔发表科幻作品。不过,如果你要查找全科幻材料,你就必须去寻找一些幻迷杂志。最有影响的是《星云》,创刊于1988年,由姚海军负责。他现在是一份科幻主题的太空杂志《科幻大王》的文学编辑。《星云》比《科幻世界》更重在理论探讨,经常刊登一些著名科幻批评家探讨中国科幻未来的论文。

拉瑞斯指出,中国大陆超过20个科幻俱乐部有他们自己的幻迷杂志;这个数字可能不准确,因为变动比较大。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银河》(郑州)、《超新星》(天津)。但至少前者由于经费问题已经停刊。这两份幻迷杂志似乎都模仿《科幻世界》,登载一些短篇小说、电影评论、读者自己的奇幻/科幻画。不过,由于缺乏《科幻世界》那么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杂志采用黑白印刷,而非彩印。幻迷俱乐部杂志《超新星》以进行一些科幻竞赛和刊登一些科幻界的内部八卦为特征。最近停刊的《银河》则更严肃一些,登载一些科幻批评、世界科幻新闻和对一些科幻权威如吴岩的访谈,当然也刊登科幻小说。两者都为小城市的读者提供如何寻找科幻(这在中国并不容易)的建议。

短篇科幻小说有自己的阵地,与此相反,当今中国科幻长篇小说一直大多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多数长篇小说依然为儿童创作,这是下面要谈到的令人担忧的事情。书店有时会进一些有限但不定期的科幻小说选。不过科幻读者要寻找某一部小说还是得去图书馆,去一些专门的科幻出版社(如《科幻世界》自己的出版社),或去找一些私人收藏者(如范霖,《银河》以前的编辑,就拥有超过1300册约700位中外作家的科幻作品)。

当今青年作家,他们都不主要创作科幻长篇小说,他们在《科幻世界》和其他杂志发表科幻短篇小说。星河是一个代表,他著名的成人科幻仅在幻迷杂志和网上才能找到,他正式出版的书都是为儿童创作的。星河现居北京,可能是中国科幻作家中唯一仅靠写作谋生的人。

在幻迷杂志练笔一段时间后,他于1991年转向全职创作。今天,他是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创作科幻和非科幻及科普作品。他的小说,如《决斗在网络》,获得了很多奖项。星河表现了对当前全球技术发展非凡的洞察力。他在提交给北京世界科幻大会的报告中,呼吁科幻作家发展“网络意识”。在引述克劳德·夏农的“沟通数学理论”后,他谈到将神经信息下载到电脑里,最后总结道,我们不必感到难过,因为人类将到达这一天、甚至否定身体,这不啻于一场新革命。他是当代中国大陆青年作家中最激进、最有国际意识的人。

王晋康也是一位深受欢迎的科幻作家,他创作的是所谓“硬科幻”。他对克隆的风险和可能性尤其感兴趣,1997年北京世界科幻大会上,他就提交了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他的作品经常在《科幻世界》发表。1996年《科幻世界》还为其科幻创作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与会者赞扬他不仅在中国恢复了硬科幻,而且创作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科幻;一些批评家指出,其许多小说的情节设置都采用了《孙子兵法》的叙事策略。

当今另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是韩松,他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他认为这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灵感源泉:如果你见得多了,你就会想得多了,当你创作时,就禁不住受到影响。他最著名的小说是《逃出优山》和《宇宙墓碑》。

这些青年作家及时地切入科技发展的前沿课题:1996—1997年间,《科幻世界》刊登了以虚拟现实、纳米技术、克隆、基因疗法等为创意的小说。王晋康的《七重外壳》写的是一位中国冒险家,他到美国,穿上一套虚拟现实的外套,从而体验了七种不同的生活。当他返回现实世界,都搞不清他看到的中国是否仅仅是一个虚拟世界。星河的《决斗在网络》里,主人公黑客变成了一种电脑病毒,他在CPU周围奔突,和另一位同样变成电子生命形式的病毒对手决斗。陈岚的《猫捉老鼠的游戏》里,电脑生命形式进化成了人类,由于他们极快地操纵他们的基因代码,因而控制了网络并最终转向外部世界。

关于中国科幻如何看待科学,杨潇在北京

世界科幻大会上指出，发达国家和中国对科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已经完成了“硬科幻”历程，现在更加关注科技疯狂发展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启示录科幻”和“社会问题科幻”成了发达国家科幻的主流方向。相反，中国科幻还处于早期阶段，依然热衷于科学和技术方面。

显然，相当小的作家群、杂志出版人、批评家构成了当今中国大陆的科幻群体。他们在《星云》发表作品，并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碰面。例如，1997年北京世界科幻大会前夕，在河北的野三坡度假村召开了一个小型的“预备会”，大约30位最有影响的科幻界人士到会，一起探讨中国科幻的未来。星河、吴岩、郭建中、王晋康、韩松等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以期提高中国科幻的地位。

科幻作家们感到，一个更急切的任务，是改变大众对科幻的态度，因为中国民众往往把科幻看作是“想入非非”。例如，1997年4月，杭州《钱江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13岁的少年由于读多了科幻而离家出走去非洲探险，最终他被警察截住了。孩子的父亲说：这个少年酷爱科幻书籍和电影，他沉迷于幻想且常胡言乱语。在北京世界科幻大会上，郭建中对此做了回应：一个见多识广、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记者的反应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大众头脑中对科幻的印象。在他们眼中，科幻甚至比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传奇小说更糟糕；科幻作家简直成了犯罪教唆者。不难想象，这篇报道对科幻文学的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科幻世界》编辑杨潇谈到一个对科幻持积极态度的例子：美国作家David W.Hill的《天幕坠落》（The Curtain Falls，显然小说标题翻译有问题，因为在美国没有这个标题的科幻小说），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图景——臭氧层遭到破坏后人类面临的灾难。这部小说1993年第一次在我们《科幻世界》发表，1994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转载了。小说在几百万中国读者中很快引起震荡，纷纷给我们杂志写信，表示一定要阻止小说中的灾难变成现实。另外，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还重印了此小说，在1995年北京国际臭氧层保护大会上发

发。

在中文里，与“science fiction”对应的是“科幻小说”，“科幻”是“科学幻想”的缩写。不过这个术语是在苏联科幻译介到这个共和国之后才出现的，鲁迅、茅盾和其他20世纪早期的中国人使用的是另一个术语“科学小说”，更接近英文“science fiction”的意思。1950年代，按照俄文的字面意思，这个术语改成了“科学幻想”。鉴于这个术语带来的负面影响，郭建中提议改掉这个称呼：现在的中文名称是“科学幻想”，然而“幻想”在中文里总是和“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胡说八道”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提议恢复以前“科学小说”的说法，这样听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而且，他认为这样也是对鲁迅、茅盾和老舍等人的尊重。前面谈到，科幻由鲁迅引介到中国后，就被广泛地看作一种科普文学。

在北京世界科幻大会上，韩松指出：在中国创作科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还和挽救经济落后国家的努力联系在一起；中国科幻不同于西方，因为它更关注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激发青少年的创造力，而不是去讨论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其他论者则不满于这种现状。在提交给北京世界科幻大会的论文里，郭建中谈到此错误看法：在中国，科幻总是被错误地作为科普的一种，其目的就在于传播科学知识。这种对科幻的本质和功能的错误看法，不仅在科幻作家、编辑、出版商中存在，而且在科幻读者中存在。科普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也热衷于出版科幻。然而，文艺出版社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兴趣。艺术和文学本是科幻之母，由于误解，她把自己的“孩子”抛弃了。

科幻学者吴岩也对科幻界中对科普功能的强调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科幻的科普功能被不适当地夸大、强化，“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科幻创作一直处于某种‘功利主义’的时代，进而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为这种价值取向直接限制了科幻作家的创作，限制了公众对科幻文学形式的理解。”

除了将科幻作为科普的工具这一错误认识，

还有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看法,就是把科幻看作儿童文学的一部分。

前面谈到,在1950年代第一次科幻高潮中,科幻就是特别针对青少年而创作的,大多数都定位于青少年市场。程嘉梓指出:我们的科幻出版部门仍偏好青少年科幻,很少例外。在提交给北京世界科幻大会的报告中,郭建中也对此进行抱怨:科幻被当作通俗文学,最不济就是儿童文学,文艺出版社忽视甚至忽略科幻;诚然,青少年喜欢阅读科幻,但这并不意味着成人就对科幻不感兴趣。事实上,青少年科幻只是科幻的一种,许多科幻大家如罗伯特·海因莱茵、杰克·威廉姆森和弗雷德里克·波尔就专门创作过少儿科幻。然而在美国,大多数科幻都是为成人读者而创作的,科幻迷可以是8岁的儿童,也可以是80岁的老年人。

郑军在《随笔八则》中,哀叹出版部门对成人读者的忽视:据统计,美国科幻读者的平均年龄是41岁……如《水世界》在中国市场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郑军认为,青少年科幻本身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不能认为,必须降低科幻作品的质量以适应儿童……不懂的地方,他们必须自己去弄懂。

确实,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对当前中国科幻质量的关注胜于对数量的关注。他们担心当前科幻高潮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作家尤异说:我非常担心,这可能是一种表面的繁荣——暂时的,由外在因素带来的繁荣,例如由北京世界科幻大会带来的刺激;因为中国有实力的科幻作家队伍还没有真正形成,中国对科幻的观念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科幻市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吴岩表达了一份额外的担忧:中国文化自身对科幻比较排斥。中国没有科学思想传统,人们习惯于“道德”的思考方式。你如何可能期待将科幻纳入到主流中去?作家凌晨认为当前中国的科幻创作依然如站在想象的门槛上眺望未来的孩子,但还没有登堂入室。郑军认为,中国科幻不应老是从好莱坞去寻找灵感,而应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寻找:我不仅希望我们的科幻作家学习好莱坞,我也希望他们学

习金庸和古老的武侠小说、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总之,学习如何让读者拿得起却放不下,即学习如何创作一个好故事。

在北京世界科幻大会上,台湾作家吕应钟给中国当今科幻作家提出了几个任务。在他看来,科幻主题一直就在中国文学中存在:唐宋时期的一些传奇小说就有一点科幻味道,《列子》里有“偃师造人”的故事,还有著名的《西游记》。他认为这些都是广义的中国科幻的典型的例子。吕应钟呼吁,第一个任务就是,编选一本中国各个时代的前科幻作品集,以供世界科幻作家阅读,这本书应包括现代的注释和阅读提示。他提出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创建中国风格的科幻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可以借鉴古典小说的手法,并转换成现代的科幻作品。当然,我们也应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口味,以将我们的科幻打入整个科幻世界。他也认识到一些困难:要定义“中国科幻”毕竟不容易,我们仍需全国的科幻作家共同努力。

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出发点”。

(1) 通过将“传奇小说”的风格现代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得到科幻小说,可以称之为“传奇科幻”。

(2) 武侠小说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和日本的武士小说或欧洲的骑士小说不同;而且,武侠小说在两岸都深受欢迎。如果能够将武侠小说的情节和科幻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创作出“武侠科幻”,这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向。

吕应钟还提议可以创作其他一些复合型的科幻类型,如“历史科幻”和“神话科幻”。

总之,尽管中国大陆科幻早在20世纪早期就由鲁迅引介进来,但可能由于缺乏坚实的工业基础,并没能流行起来。直到1950年代,科幻小说才热起来。即使此时,科幻很快就被看成了一个儿童文学,“功利主义”的脚镣一直束缚着那时的科幻创作。直到1970年代末,童恩正等人开始探讨生活问题和人性问题,从而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并没能持续多久,因为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作家受到冲击并被迫停止了创作。

尽管如此，中国科幻自 1991 年后还是东山再起，且看起来充满了希望。科技部现在比较支持科幻创作，希望借此可以激发青少年学习科学知识；科幻也和 2000 年的中国航天梦联系起来。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科幻迷（尽管在四川和北京最流行）。中国的出版界也经常报道科学的最新进展，即使在北京胡同的人们也在谈论克隆羊和火星生命的话题。大多数好莱坞科幻电影都很容易在音像出租店或黑市里找到；孩子们都梦想着能够离开地球到太空去建立空间站。

中国依然没有出现很多杰出的科幻作家。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性的阶段。小说里往往充斥着各种前沿科技术语和发明，从而使情节和性格化受到损害。尽管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且并不稳定，但如果现在这种繁荣局面能够维持下去的话，假以时日，几年内中国一定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科幻作品。

大家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影视制作公司是否愿意再投拍一部科幻电影？据我所知，中国大陆迄今为止只有两部科幻电影，一是前面提到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一是 1987 年由张之路执导、仅投资 47 万经费的科幻电影《霹雳贝贝》。在接受《星云》的访谈时，张之路和他的同事刘牛表示，如果他们能够筹集到经费和招募到称职的人员的话，他们有兴趣投拍一部新的科幻电影。他们预想中的中国科幻电影，既有东方电影的人文气息，又采用西方电影的高科技制作手段。

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诸如科幻的文体依然被看作科普文学或儿童文学，但是，最近有向成人科幻发展的趋势，科幻很可能成为一个持久的现象。中国科幻拥有巨大而稳固的读者群，他们将自己看作一个亚文化圈。中国科幻第三次浪潮很可能正在完成，经由美国和欧洲早期科幻发展同样的历程：热情的草根支持、非正式幻迷网络、胶印杂志、即兴电影节等等。最后，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很容易和外国科幻同仁进行接触。

随着中国科幻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热心科幻的人去关注和研究。据说，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位学者正在撰写中国科幻研究的专著。可惜由于时间和版面的关系，我未能在这份关于中国科幻的概述里，对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进行详细的解读，也没能探讨一下中国大陆仅存的两部科幻电影。如果探讨一下台湾和香港的科幻，尤其是受到大陆读者热捧的香港作家的“卫斯理”科幻系列，那也是同样让人感兴趣的。这些能留待后来者进行了。

近些年，关于中国科幻的学术研究已经兴起，科幻教育也已开展。如，著名科幻理论家吴岩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深受欢迎的科幻课程；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将科幻讲座纳入到课程体系之中；由郭建中教授牵头的科幻研究中心让杭州大学引以为豪。《科幻世界》编辑部，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安排了校园科幻创作大赛，也许以后中国科幻文学史就将由他们来改写。

（上接第 69 页）

合理地进行日常体育锻炼，了解气象因素在体育训练、比赛中的作用，以及气象条件对体育比赛规则制定的影响等等。这部动画片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体育气象知识。比如：对同一运动员而言，逆风的情况下掷铁饼若调整好投掷角度，反而比顺风时要投得远；自行车比赛中的跟随战术和一字形阵列可以起到很好的省力效果；湿度对乒乓球的影响竟然可使乒乓球

落点产生一米的误差，如此种种。在奥运会及之前的所有运动知识宣传中，这样与众不同的体育气象知识就显得新鲜有趣，差异化中又切合奥运主题，自然很受欢迎。

总之，选择一个好的题材将打开科普动画创作通往成功的大门，让后续的创作有着很好的发挥空间，让气象科普动画片深受小朋友的喜爱，更让投资者看到广阔的市场前景。